

論正當防衛認定中的防衛人退避義務

薛文超*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 澳門)

摘要: 面對能躲避的不法侵害, 防衛人是否有退避義務, 是正當防衛認定中的疑難。歐陸理論通說是防衛人無須退避, 英美法歷史上是以肯定退避義務為原則, 我國內地實務上不要求防衛人退避, 除非遭遇無行為能力人侵害時存例外。2005年以來美國多個州通過的“不退避法案”全面否定了防衛人存在退避義務, 但這一立場面對爭議巨大, 不斷有重新修法肯定退避義務的動議。美國學界對正當防衛退避義務的研究是效果性的, 而歐陸與我國理論上缺少對防衛認定與否的效果關照。正當防衛在我國內地司法實踐中的確存在“唯結果論”以及相對於規範本身的限縮適用問題, 但也不可矯枉過正, 不能使正當防衛的成立走向另一個極端。使用致命性防衛手段的防衛人應當存在退避義務, 在具有退避可能性前提下, 法益權衡與比例原則約束正當防衛的成立。

關鍵詞: 正當防衛; 防衛必要性; 退避義務; 不退避法案; 緊急避險

The Duty of Retreat in Self-defense Law

Wenchao XUE*

(Faculty of Law,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in determination of self-defense that Whether the defenders have the duty of retreat in the face of the unlawful infringement which can be avoided. The continental theory stands that defenders do not have to retreat, and China takes a similar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Anglo-American law, the principle was the obligation of affirmative withdrawal. The SYG bill passed by several U.S. states since 2005 totally denies the retreat duty in defense, but the SYG bill faces controversy due to the 2013 trial of Trayvon Martin in Virginia. Based on the social effect of case law, the American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duty of retreat in self-defense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ositions on social security. In our judicial practice, self-defense has a results-only situation, which limits the authorized defense right. However, the recognition of self-defense should not be overcorrected and go to the other extreme. The defender who uses the fatal defense means should be obliged to retreat.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retreat, the principle of balancing and proportion of legal interests restri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self-defense.

Keywords: self-defense, necessity, duty of retreat, Stand Your Ground Laws(SYG), emergency measures

0 問題的提出

當造成不法侵害的威脅時, 如被侵害人在很大可能性上能躲開險境, 但卻並未逃離而是選擇

實施“以暴制暴”的防衛行為, 甚至採取致命性暴力手段殺死不法者, 是否屬於正當防衛而阻卻不法? 這是正當防衛認定中防衛人是否有退避義務的問題。如勞東燕教授認為, “防衛人不負有

收稿日期: 2020-03-04; 修訂日期: 2020-03-30。

*通訊作者: 薛文超, 男, 博士,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刑法學、犯罪學。

E-mail: wxue@must.edu.mo, Tel: 00853-88973292

退避義務在各國刑法理論上幾乎沒有爭議，建立在法益權衡基礎上的優越利益原理無法解釋不退避的立場。”^[1]加之，正當防衛在我國內地司法實踐中的“唯結果論”以及相對於規範本身的限縮適用問題，越發成為學界和輿論所重視的話題。^[2]“司法實踐中，對於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仍趨保守，不敢或者不善於適用正當防衛制度，將本屬於正當防衛的行為認定為防衛過當，甚至認定為普通的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的現象，仍然客觀存在。”^[3]照此理解，若肯定防衛人有退避義務，則也就意味著對防衛權的削弱，進一步限縮正當防衛的成立範圍。但是，防衛人退避義務有無的問題並非如此簡單推論。值得注意的是，正當防衛判斷中的防衛人退避義務，在歐陸與英美刑法發展史上，特別是晚近英美刑事立法經驗來看，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其學術爭議內容較有啟發性。無論對有無退避義務本身、例外情形，抑或所持立場的根據，都很有爭議。結合內地司法實踐來看，學界通說觀點失之絕對化。防衛人有無退避義務爭議，有著深厚的法文化背景與法效益上的理由，有必要對相關論爭進行考察和研究，對防衛人退避義務的有無給出充分的理由。

1 大陸法系理論的基本立場與我國內地通說之考察

1.1 原則上無退避義務的基本立場與依據

判斷不法侵害受害人正當防衛之成立，實際上涉及受害人與防衛人（受害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法規範所設定的行為預期。防衛人在遭受不法侵害時有無退避義務，換言之，在存在退避可能性時而不退避的情形，是否成立正當防衛？抑或，防衛行為是否需具備“不得已”要件？在這一問題的立場上，大陸法系主流刑法理論與我國之通說基本契合。以 Roxin，Kindhäuser，Murmman，Bülte 等學者為代表的德

國刑法理論通說認為，防衛者不負任何退避義務（Ausweichpflicht），防衛者只要對抗不法侵害者，無須顧慮其有無罪責，防衛者亦不負退避義務，也不考量個案的法益權衡關係，可採取“果斷且無須遲疑性”（Schneidigkeit）的防衛措施。^[4]換言之，當防衛人在面對不法侵害時客觀上可以躲避但未退避，而直接實施“反擊”的防衛行為時，也屬於正當防衛。在我國司法實務中，以“於海明正當防衛案”為代表的案件，使得“法不能向不法讓步”成為司法機關和學界頗為肯定的論點。^[5]

其一，“法定權利說”或“優越利益說”。從正當防衛權屬性上理解防衛人有無退避義務，德國通說認為正當防衛阻卻違法的基礎是保護防衛人的更為優越的利益（Überwiegende Interessen），即“合法無須向不法讓步”（Das Recht braucht dem Unrecht nicht zu weichen）。^[6]也可以從緊急權角度理解，正當防衛是法律緊急權體系之一部分，是一種法定的權利，“緊急時無法律”。團藤重光將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自救行為和義務衝突，都認為是在緊急狀態下所產生的權利。^[7]我國內地學界通說認為，“正當防衛是與違法犯罪作鬥爭的積極手段，是公民的權利，並非制止不法侵害的最後手段。換言之，中國刑法並未將正當防衛規定為一種“不得已”的應急措施，並未要求防衛人窮盡一切手段之後才能實施正當防衛。相反，即使防衛人在有條件躲避不法侵害或者求助司法機關的情況下，仍然有權實施正當防衛。”^[8]

其二，“必要性說”或稱“個人權利保護說”。對於遭受不法侵害的行為人而言，可以不退避地實施防衛行為是拯救生命等緊迫利益必需的。“所謂防衛的必要性，是指防衛行為是排除侵害所必要的行為。與緊急避險中的補充性要件不同，它不以行為人沒有其他辦法為必要。對於不法侵害，行為人即使可以採取躲避等其他方法但不躲避而實施反擊的，也符合防衛的必要性。”^[9]“……基於維護法律秩序的立場，不應要求 A 只可選擇逃避而非反擊行為，故在面對多數人開槍射擊包

圍下的防衛者，採取擊斃對手的措施，以保全性命，即屬必要的措施，而得適用正當防衛以阻卻違法。”^[10] 因此從效果上為不退避地防衛提供依據。由於退避本身不必然能夠發生預期作用，退避不成功還是要通過防衛手段對抗，退避方法的失效可能增加攻擊的強度，造成更多損害。因此主張退避義務之目的是避免兩敗俱傷，但是過度課予退避義務，反而是兩敗俱傷，特別是促進被侵害人受害的原因。

其三，“法秩序保護說”或稱“法確證原則”。德國主流觀點認為該見解之基礎是法確證原則（*Rechtsbewährung*），“防衛者透過反擊捍衛、保護了法的秩序，其反擊行動當然應果敢為之，沒有必要顧慮或關心原不法侵害者的法益，即便有其他雙方均不成傷的退避可能性。”^[11] 臺灣學者許達恒不認同法確證原則，基於個人保護觀點認為防衛者也不負擔優先退避的法律義務。侵害者之法益因侵害強度而部分“懸置”法外，喪失了法益屬性的利益，因此防衛者可以積極侵害，不違反法秩序，是暫時不屬於法益的利益，也不再尋找任何法之保護機制的必然推論。^[12] “確證”也可以被理解為刑罰的積極一般預防論中追求的公民對法的信賴效果，確證了法規範的妥當性。^[13] 實施正當防衛以傷害侵害人的合法根據來自於不法侵害對法規範的動搖。

1.2 例外有退避義務的情形與依據

在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上，較少有學者認為原則上防衛人有退避義務。只有佐伯仁志有這一立場的表達。他認為，只要出現正當防衛的情狀，任何防衛者均負有優先採取退避措施的義務，理由在於“正當防衛不可避免將造成侵害者法益受損，為求雙方之間利益的最大化，或可要求防衛者優先採取退避措施，不僅防衛者可以保護自己，也不會造成侵害者的利益受損，是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案。”^[14] 在通說意義上，大陸法系的主流觀點都是認為在特殊情況下防衛人有退避義務。但

是該特殊情況的範圍，不同理論與實務立場有所不同。

在《德國刑法典》第 32 條第 1 款規定的緊急防衛“要求性”，也即“被（法律）允許性”的判斷中，羅克辛認為有五種情況下緊急防衛權可能受到限制，並稱之為緊急防衛權的“社會道德性限制”，具體包括：（1）無罪責或者有重大減輕罪責的攻擊；（2）由被攻擊者違法挑起的攻擊；（3）輕微攻擊；（4）在保證關係範圍內的攻擊；（5）通過威脅的勒索性攻擊。^[15] 羅克辛對防衛人例外有退避義務的情形，大致是從侵害人的主體特徵與不法行為危害程度兩個方面進行限定。但在遭受精神病人的攻擊等情況下，也並非完全排斥防衛行為，必須判斷是否出於“道德上的理由放棄對防衛所必要的措施”。羅克辛還將“逃跑”的含義進一步擴大，他認為當招來其他人的幫助就是一種逃跑，並且會暫時給攻擊者以控制權時，就不必要實施防衛。也即，向他人求助也是防衛，例如學生在面對攻擊他的同學時，有義務首先尋求老師的幫助。不可以一種“粗暴的榮譽概念”，鼓勵學生採取放棄攻擊者生命的手段進行防衛。^[16]

還有學者認為，德國之通說是原則上被攻擊者必須使用最婉轉的，即最小危險的或損害的防衛手段等，不需要局限於純粹的防守（“保護的防衛” *Schutzwehr*）。當情勢對於攻擊的防衛是必要的時，可以轉向而為積極的對抗的防衛（“抵抗的防衛” *Trutzwehr*）。但存在例外情形，當具有較少的攻擊強度的案件，例如被一個醉漢所侮辱的人，不可立即使用暴力，而在住宅被侵害的人，在不得已之時必須請求警方的救助。^[17]

在德國司法實務的觀點上，防衛人有退避義務的判例局限在“親密親屬間的正當防衛”和“挑唆防衛”兩種情形之中，但裁判立場並不完全一致。德國判例認為，當丈夫不法侵害妻子時，妻子的防衛權因最近親屬之故而受有限制，妻子負有退避義務。如果無法退避以保全雙方法益時，也只能設法採取較和緩的反擊措施。^[18] 但臺灣有學者認為，這一立場並不妥當，不論從保證人地

位，或者親屬或婚姻制度所產生的社會連帶等觀點，都無法合理說明最近親屬負退避義務的理由，從保證人的觀點上，當保證人成為防衛者時，會陷入保護對方 / 保護自己的兩難關係。因此認為，挑唆防衛是唯一可以限制正當防衛“果斷而無遲疑”特性的規範事由，必須先行退避。^[19]

在日本實務判例中，對防衛人是否具有退避義務也存在爭議，裁判立場發生變化，核心在於對不法侵害“急迫性”的解釋。1955 年的判例認為被告人早已預見不正侵害而迅速有力地予以還擊。這一不正侵害不能言之為急迫，因此否定了正當防衛。^[20]1970 年日本最高裁判例修改了立場，認為“刑法第 36 條所謂急迫，是指法益侵害現在已經存在，或者已經逼近身邊，即便事先已經預期到該侵害，也不應認為這種預期可直接導致急迫性的喪失。”^[21]這裡重視的還是，有合理理由不回避已經預期的侵害。但立場在 1976 年再次轉換，最高裁認為“正當防衛以存在侵害的急迫性為要件，但其宗旨並不在於已經預期到的損害，科以應當回避的義務，因此，即便是當然或幾乎已確定地預期到侵害，也不應認為這種預期可直接導致侵害的急迫性的喪失。然而，從該條將侵害的急迫性作為要件的宗旨來看，在並非僅僅是未能避免所預期到的侵害，而是出於利用此機會積極地向對方實施加害行為的意思而面對侵害的場合，認為這並未滿足侵害的急迫性要件是合適的。”^[22]其核心在於存在“積極的加害意思”時否定急迫性，並不成立正當防衛。例如，2001 年一起判例中，防衛人在確信暴力團成員就要趕來襲擊之後，本有充分的時間可以離開辦公室，或者請求員警的幫助，卻並不採取這種措施，而是做好充分的反擊準備，實際上也實施了反擊，應否定存在急迫性，不認定其成立正當防衛。^[23]可見，日本實務原則上肯定防衛人無躲避義務，但是在例外情形下足以認定“加害意思”的侵害不認定為防衛行為。

我國內地通說觀點認為正當防衛制度是鼓勵公民與犯罪作鬥爭，但是，司法實務中的傾向卻

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傾向”，“裁判者常用迂回的方式將退避義務引入到正當防衛的構成中”，^[24]表現為以缺乏緊迫性、必要性或者防衛意識，將反擊行為人的為“鬥毆”“互毆”或者故意傷害。通說上認為例外主張防衛人應有躲避義務的情形主要有三類：（1）侵害人是未到達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2）侵害人是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25]（3）防衛挑撥的特別情形，“防衛挑撥人可以行使有限的正當防衛權。所謂限制，一是指這種正當防衛必須出於迫不得已。如果能夠躲避就應當躲避，能夠緊急避險就應當緊急避險，能夠用其他方法保全本人的人身，就應該採用其他方法。”^[26]這一“原則 + 例外”的通說立場肯定了在一般情形下，防衛人即使在有躲避可能性時，也可以實施防衛行為，除非特定例外。例如《刑事審判參考》曾刊載一例精神病人侵害的案件，認為“被侵害者不得對精神病人採取可能損害其利益的攻擊性防衛措施。”^[27]

1.3 大陸法系與我國內地通說存在的疑問

第一，作為論證防衛人無退避義務價值基礎的三種學說，也包括例外上有退避義務的根據，實際上都存在疑問，存在論證上的“明希豪森困境”。“法定權利說”為防衛人不退避提供了一個不容反駁的高階出處，但某一特定權利的正當性從來不來自於其本身。“法秩序保護說”與“個人權利保護說”雖然給出了實體上有一定說服力的理由，但存在著論證上的片面。法秩序從來都不是單方的法秩序，防衛人與加害人同樣是法秩序的一部分，降低對一方法的保護需要充分的理由，而非僅給出一個加害人安全法益“懸置”法外的論點即可。這種武斷終止論證的結論，顯然並沒有提供真正的依據。對於例外情況而言，兩類無行為能力人退避義務是否違背個人保護原則？這種情況降低對防衛人保護依據是什麼？很顯然，都不是可以單純通過理論可以得出結論的問題。

第二，原則上堅持不退避原則的法效果如何，或許是真正能夠回答防衛人是否有退避義務的理由。刑法作為行為規範，並非僅是個案的權衡，更給社會確定行為預期。三階犯罪論體系中，正當防衛作為違法性排除事由，防衛本身是符合構成要件的有危害結果的行為。雖然刑法並不將其評價為犯罪，但並不意味著造成傷害的事實本身是法所期待的。況且防衛過當本身就是一種犯罪。鼓勵不退避很容易導致防衛行為由合法滑坡到犯罪，並在整體上影響社會安全。在無論歐陸抑或我國內地的文獻中，都較少涉及對肯定退避義務的防衛案件對社會治安的影響以及個案的社會影響這一效果性評價。

第三，防衛人退避義務有無需要面對的法益衡量與價值難題是：不法侵害人的生命法益真的不值得保護嗎？探討退避義務的場域是，防衛人在確實能夠躲避侵害的情況下，是否可以採取防衛手段，進而肯定對不法侵害人合限度的傷害。肯定退避義務的價值主張“生命法益高於財產法益”“生命法益高於身體法益”受到學者的批評為“貌似無可辯駁的抽象說辭”。^[28]但這種價值又並非無意義。法是否降低對侵害人的保護本身才是一個缺乏原理性的需要證明的主張。不法侵害人的法益在防衛人有退避義務時，是否值得保護，這種價值權衡並非空洞的疑問，而是實實在在的兩難。

2 英美刑法中的正當防衛退避義務：Stand Your Ground原則與Duty of Retreat原則的爭議

2.1 肯定防衛人退避義務的普通法傳統及其立場轉向

在普通法歷史上，對不法侵害實施正當防衛（self defence）是現代法的一個基本原則，但這一確立並非天然的。在英國中世紀時期緩慢發

展，直到西元 13 世紀，以正當防衛為由實施的殺傷（homicide）也是違法行為。19 世紀以來英國普通法全面承認了實施正當防衛可以實施致命暴力的一般原則，但該防衛行為受到必要性原則（necessity）的嚴格限制。普通法傳統對防衛人退避義務的立場是一致的，即原則上有退避義務以及在例外情形的可不退避。遭受蓄意殺害、搶劫、綁架、強姦等威脅人身、財產等行為的受害人，在採取可能導致不法行為人生命危險的防衛行為前，應當先履行退避義務。但是，如果這侵害是發生在住所（residence）的話，就不要求履行退避義務，這被稱為“退避原則”（Duty of Retreat）與“城堡原則”（Castle doctrine；defence of habitation）。後者的稱謂是由於將住宅視為人的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在退無可退之時，可採取無限制的防衛行為。

英國普通法傳統對正當防衛規定了嚴格的退避義務（duty of retreat），除非能夠證明其對侵犯者（aggressor）實施暴力殺害行為前，其已經退無可退（back to the wall）。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曾闡釋了這種觀點：

“法律要求，當一人在其自衛中殺死另一個人，應當已盡其可能採取安全的退避，以避免對襲擊者使用暴力。這種退避不應當是虛假的，或者是伺機而動，而是出於一種盡力避免讓同胞流血的真摯情感。在兩國交戰時，這樣做可能會被視為懦夫之行，但是對於受法律管束的兩個主體而言，沒有這種榮譽可言——國王和法庭才是不法行為之復仇者（vindices injuriarum），會給予犯錯的一方應得之懲罰。”^[29]

雖然防衛人原則上有退避義務，但是這一原則卻一直受到不同觀點的挑戰，並進而逐漸轉變為以不退避（No retreat）為原則。柯克爵士（Edward Coke）就認為退避義務對於遭受侵害的人來說是不恰當的。^[30]在英國 1969 年的判決中，法庭認為退避是構成正當防衛抗辯理由的先決條件（pre-requisite），防衛人必須以實際行動表明其不欲採取武力的意思。但這一立場已被改變，在 1985 年

一起案件中，上訴法院認為，儘管防衛人表明不欲暴力對抗的行為是表明其出於善意防衛的最好證據，但在一般情形下，自我防衛無須退避、妥協。但是，當退避是唯一的合理（reasonable）選擇的情形，防衛行為（stand and fight）就不再是正當的。^[31]可見，英國法對退避義務原則上是否定的，但基於合理性的判斷，將個案中是否構成正當防衛委諸司法裁量。當有躲避可能性時，即使非致命的暴力（non-deadly force）防衛措施也是不合法的。^[32]

美國在早期同樣對正當防衛規定了一般性的退避義務，同時規定了一定情形下的例外。不過，在 19 世紀中晚期以後，以聯邦最高法院和有影響的數個州法院裁判為代表，美國本土法律觀點轉向了不退避（Stand Your Ground）原則成為強觀點。最具開創性的案件是 1876 年的 *Erwin v. State* 案件。愛荷華州高等法院認為，一個無辜的個人，無義務躲開那些試圖採用暴力和無法預知的手段，惡意地嚴重傷害生命或肢體的不法侵害者。^[33]而且這一認識並非基於促人免於懦弱（cowardice），而是因為“Stand Your Ground”原則是最好的保護和防衛人生命的手段。1877 年印第安那州高級法院同樣重申了不退避原則，在對 *Runyan v. State* 案的判決中，推翻了下級法院的判決中對退避原則的堅守和“necessity”要件的肯定。^[34]

“身處住宅之內”作為退避原則的例外是一個發展的歷程。1895 年，美國最高法院在 *Beard vs. U. S.* 案中，確立了現代法上的城堡原則（Doctrine of Castle），即在住宅遭受襲擊之人，可採取無限制防衛。自從 20 世紀初開始，處在其住宅之中，只要其合理的相信有必要採取措施保護其自身，就可以採取致命暴力。^[35]在 1921 年的 *Brown v. U. S.* 案中，霍姆斯（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援引並肯定了 *Beard v. U. S.* 案的立場，他認為不退避原則是更符合人類天性的。^[36]霍姆斯認為：“面對出鞘之利刃，無暇可為冷靜之權衡”，^[37]在緊迫傷害帶來的壓力下，作出是否退避的精確判斷是超出人能力範圍的。*Brown* 案確定的先例是，

由住宅享有的完全不需退避的特權，進一步擴大到任何行為人有合理理由擔憂將遭受緊迫的身體重傷或死亡的傷害的情況下。有觀點認為，霍姆斯的判決不僅使得司法上免除了遭受致命暴力危害者的退避義務，而且是普遍的 SYG 原則的立法的開始。^[38]

“一個長時間適用的法律規定並非其為正確的理由”，對於不退避原則來說也是如此。轉向防衛人不退避的理由在於：一、該原則可以拯救生命。潛在襲擊者可能因為考慮到被襲擊者有權合法殺害而放棄實施危害行為。二，退避原則要求無辜的被襲擊者在面對緊迫危險時採取退避或迎擊的生存可能性，這是強人所難的，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假設”。^[39]神經學家證明了這一點，第一，大腦控制包括恐懼、焦慮情緒的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在面對高強度壓力時，能壓倒理智的功能區；第二，這類情況下的情緒崩潰會促使個人作出無意識的行為選擇。^[40]第三，一些法院判決基於公平原則等確認了不退避原則。例如 1990 年 *Culverson v. State* 案被指控一級謀殺的被告人以法官不適當地向陪審團闡釋正當防衛應當滿足退避義務，^[41]內華達州高級法院推翻了下級法院判決，肯定了不退避原則，並援引了 90 年前的先例 *State v. Grimmer*（1910）。此外，還有法文化的因素的觀點認為，在 1800 年代，脫胎於英國普通法的美國法開始改變普通法傳統。特別是以牧業和種植業為經濟重心的美國南部和中西部地區，對勇氣和榮譽（bravery and honor）的推崇，與工業化的東部地區不同，不成文法上認為防衛不須負退避義務。到了這些地區逐步工業化後，這些不成文法傳統依舊保留下來。^[42]

儘管實務上有裁判觀點轉向不退避原則，但美國模範刑法典（The Model Penal Code, MPC）一直規定了防衛人的退避義務。“防衛人在能夠採取躲避或者通過放棄對物的佔有的情況而避免損害時，採取致命性暴力手段不是正當防衛。”^[43]同時，也 MPC 也規定了城堡原則，即在住所（home）被襲擊的情況下，可不退避地直接採取

致命性暴力措施。^[44]依普通法的通說，採取致命性暴力手段而被認為合法的正當防衛需要有三個要素：（1）必要性（necessity）；（2）比例性（proportionality）；（3）合理的確信（reasonable belief）。^[45]必要性要素要求，在防衛場合使用暴力，包括致命性暴力手段（deadly force）與非致命性暴力手段（non-deadly force）只有在必要的程度上才應該被採用。只有當防衛人沒有其他選擇時，才可以採取致命性暴力。如果採取非致命性防衛對於制止襲擊是充分的，那麼就不應當使用致命性防衛手段。^[46]普通法判例對正當防衛必要性規定了“迫近的”（imminent）和“直接的”（immediate）兩個要素。^[47]這就意味著，普通法對成立正當防衛要求防衛人先履行退避義務。對此，要求防衛人退避是法律和社會重視人生命的保護，超越了對個人在面對襲擊時表現出男子氣與勇氣（manly or brave）這一價值。^[48]

在我國學者翻譯的英美刑法的著作中認為，肯定可以“不躲避”使用致命暴力是司法實踐中較少存在情況，並指出“趨勢是遠離‘不躲避’規則。”^[49]這一觀點並未總結美國各州的實際立法狀況，其指出的趨勢也並不準確。^[50]也有研究認為，美國對於正當防衛退避必要性問題，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認為就整個社會來說應盡可能地減少不必要的損害，應採取能退避就不自衛的態度，這是普通法的傳統觀點；另一種認為對侵害者躲避無異於鼓勵犯罪，是不光彩的丟臉做法，因此在即使能夠躲避時也可以進行自衛。在美國，後一種觀點占統治地位。但極少數州採取了前一種態度，並作了一些補充，例如，在使用致命暴力之前，如果防衛人可以安全躲避，則應當躲避。^[51]這一認識是基本符合2005年後美國各州大量修法之前的狀況。

2.2 不退避原則立法的背景與內容

在20世紀後半葉，逐步提升的城市化和犯罪論，驅使著正當防衛權利的進一步成比例地

擴大。^[52]2005年10月，佛羅里達州修法，通過Protection of Persons/Use of Force Bill法案，對四條法律確立了“Stand Your Ground”（SYG），即不退避原則（No Retreat），對於遭受致命威脅的受害人來說，並不負有首先試著採取躲避的責任。^[53]這一立法改變了自我防衛中的城堡原則，取消了在使用致命暴力前有先行躲避義務的規定，即改變了原有傳統上正當防衛成立的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則的內容。^[54]這一修法直接改變了類似案件的罪與非罪判斷。在法案通過一年之前，聲稱因擔心遭受醉酒乘客襲擊而強殺乘客的Robert Smiley案獲得有罪判決，但如果該案件發生在一年之後，那麼可能會被作為正當防衛認定。^[55]肯定的觀點認為，SYG法案並未創設一個新的權利，也即，在公民感受到侵害所帶來的緊張、恐懼和危險時採取防衛行為，是一種歷史性的自然權利，它根植於不可剝奪的自我保護的權利。^[56]在佛羅里達州之後，三十餘個州陸續通過了類似法案或者以判例確認了不退避原則。

佛羅里達州SYG法案的核心在於，將無限制的不退避實施防衛，特別是致命性防衛手段的條件擴大到公共場所遭遇的侵害。而在此前，採取這種防衛手段的情境受到嚴格限制。佛羅里達州在1929年Pell v. State案中首次明確闡述了不退避權（“Right to stand one’s ground”），除了在一般情況下實施正當防衛負有在使用致命暴力前應當先行退避義務的情形，在自己住宅遭受暴力襲擊的，無須退避。^[57]此後，通過判例陸續擴大了可不退避防衛的情形。其中關於住宅的界定、防衛人與侵害人關係等，都值得關注。

1965年，佛羅里達州高等法院擴大了這一無須退讓權利的適用範圍，即使襲擊是來自處在住宅中的受邀者或客人，同樣適用。^[58]不過，無論佛羅里達州高等法院抑或美國最高法院，在Bobbitt案中都否認了該原則適用在同居關係的兩人發生傷害中的正當防衛行為。^[59]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城堡原則的基礎在於每個人在其住所中免受侵害的利益是最大化的，但對於同居一處的人

來說，雙方並無一方優越於另一方。

但是到了 1999 年，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在 *Weiland v. State* 案中，針對是否推翻 *Bobbitt* 案的判決發出複審令。法庭判決認為該案婦女具有“受虐待婦女綜合癥”（*Battered-spouse Syndrome*）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社會問題，應當認定受害婦女可不負有退避義務。首先，*Bobbitt* 案確定的原則是建立在對財產權利之上的，而非人身權之上的；第二，家庭暴力在社會中的持續嚴重化使得有必要確定更嚴格的保護政策。因此，應當將住宅視為“一個人最後的避難所”（*the ultimate sanctuary*），城堡原則應涵蓋來自配偶的襲擊。^[60]

佛州的城堡原則的適用也從住宅擴大到工作場所（*place of employment*），聯邦第三巡迴法庭在 *Redondo v. State* 案中如此認為。^[61] 且如在住宅遭受襲擊的立場一致，均存在著一種例外，即同在一處工作者（*co-workers*），並不適用於城堡原則。^[62] 不過，城堡原則的擴大也不是沒有限度的。在 2003 年的 *State v. James* 上訴案中，聯邦第三巡迴法庭判決，受邀請到住宅中的第三人實施防衛行為並不被免除退避義務，這是基於被邀請者缺乏住宅所有人所具有的最後避難所權利。^[63] 而且，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同樣拒絕將城堡原則適用於汽車（*vehicles*）。在 *Baker v. State* 案，法庭認為，汽車本身為駕乘者提供的退避的手段，不宜免除退避義務。^[64]

更為細緻地分析，SYG 法案的內容主要有：

1. 免除了在公共場所的正當防衛退避義務，將城堡原則的限制條件取消。
2. 允許對侵害對物的佔有（*defence of Property*）而非人身的行為實施致命性的防衛手段。至少有九個州的 SYG 法案允許對於沒有身體傷害危險為了保護物權而允許槍擊。^[65] 還有一個州甚至允許這種情況下侵害者在逃跑中實施槍擊。^[66] 四個州允許為了保護包括現金、手機和相機等個人財物而使用致命性暴力。^[67]

3. SYG 法案帶來的一個程式上的預設：在某些情形下用槍殺人是合法的。在受害人（發起襲

擊者）死亡，且沒有證人或者錄影作為證據的情況下，一般就很難推翻辯解，這迫使裁判者必然只能宣判其無罪。而傳統上對於無罪的證明，是建立在排除合理懷疑之上的。

4. 刑事程式上對逮捕可能涉嫌防衛過當者更為困難。修法之前，一般是基於一種合理的確信（*reasonable belief*），槍擊殺害某人的一般足以引起逮捕。但是，六個州的 SYG 法案要求，對於主張基於正當防衛目的槍擊的行為人，員警如果不能發現否定其主張的證據，就不能實施逮捕。^[68] 這會導致偵查程式上的困難。

5. 裁判程式的改變。八個州的 SYG 法案在刑事起訴程式之前，建立了訴前的審理程式（*immunity hearing*），^[69] 由法官根據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決定是否行為人屬於正當防衛，如構成，則撤銷案件（*dismiss*），如不構成正當防衛，則案件進入審判程式（*trial*）。這一程式的設置，改變了由陪審團審判案件事實的做法。

6. 民事責任的免除。十一個州的法案對於合法使用暴力的行為完全免除了民事責任（*civil immunity*），包括引起無辜第三者傷害的情形，也不能對行為人提起告訴。^[70]

2.3 不退避原則立法引起的爭議與修法動議

SYG 原則這一個百年歷史的陳舊話題在近年來有了新的闡述，佔據了主流媒體的頭條，並成為公眾輿論、學者的關注焦點，甚至成為影響和改變司法體制的力量。^[71] 2013 年夏天，George Zimmerman 射殺 Trayvon Martin 一案，弗羅裡達州的無罪裁判引起了相當大的政治風暴，並對 SYG 原則的適用產生了動搖。

對 SYG 原則三個有影響力的指責（*incendiary charges*）是：第一，該原則內在是種族主義的；第二，立法確認該原則其動因是全美步槍協會（*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主導的推動擁有槍支運動；第三，該原則促進和提升了致死暴力事件的發生率。雖然通過 SYG 法案的州都聲稱是為了防

控犯罪（deter criminals），但是研究發現，這些州的搶劫、盜竊案件的發生並未受法案實施的影響。同時，這些州的殺人、傷害案件發生率卻在上升。應當正視 SYG 法案實際上免除了在種族群體中的行兇者、毒販、暴徒等人在傷害案件中的法律責任，並且實際上導致了犯罪率上升。據 2013 年的一項研究，在佛羅里達州通過該法案後，被裁判為合法的殺人案件（Justifiable Homicides）比例上升了 200%；對當時全部 22 個通過了 SYG 法案的州，這一數位為平均上升了 53%。^[72]該原則的確立受到質疑，反對和批評者稱之為 Shoot First 原則，即“Shoot first, Ask Questions Later”。批評者認為，這一法律可能會導致該州陷入更多暴力的境地，特別的對於佛州這樣一個高犯罪率、人口眾多、監獄人滿為患、種族複雜的州來說更是如此。^[73]

Trayvon Martin 事件發生後，州政府委派小組調查 SYG 法案爭議。2013 年，該調查的最終報告出爐。^[74]報告指出，“違法行為”要件應當被進一步明確，以確保法律統一適用，並使無辜者免受不當侵害，概念缺乏明確性也會使得法律適用不一致。而這一概念是認定是否成立了正當防衛的基礎性（fundamental）概念。有學者專門研究了“違法行為”概念的範圍問題，建議法庭在司法適用中應統一概念。^[75]有觀點認為，SYG 法案破壞了普通法認定正當防衛的必要性要素（necessity），取消了執法、檢察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增多了暴力活動。^[76]2013 年 5 月，美國民事權利協會（the U.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USCCR)）以 5：3 的投票勝出，決定對 SYG 法案引起的種族歧視（racial bias）問題進行調查，這是近十幾年來該協會第一次有關種族問題的調查。

2013 年，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BA）也組織了一個專門的調查小組（National Task Force on Stand Your Ground Laws），對美國多個州通過 SYG 法案的情況及其對刑事司法系統與公共安全的影響進行研究。^[77]該報告指出，SYG 法案缺少必要性（necessity），主要包括：

（1）法案帶來的問題遠多於解決的問題，對法案內容的解釋分歧與模糊邊界使其適用更加困難，而修法之前對公民的保護本已充分；（2）SYG 法案的不退避抗辯，實際上多是由毒品犯罪者、非法持槍者等刑事慣犯所主張，SYG 法案使公民享有過多的使用致命暴力的自由，使其幾乎有了“殺人執照”（a license to kill）。^[78]；（3）SYG 法案對於遏制暴力犯罪並無實際作用。研究者給出了詳實的資料，據研究者估計，因該法律的頒佈，每月會多發生 28 到 33 名白人男性被殺事件，以 2010 年的資料為例，這一數量約佔到全面被殺害人數的 8% 到 9%。^[79]而且，儘管槍支協會聲稱 SYG 法案的目的在於遏制犯罪，但是有學者研究了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s (UCR) 的實證資料，發現沒有證據表明法案對於盜竊、搶劫等犯罪有任何的遏制效果。^[80]法案產生的“一個自相矛盾的結局是，法律賦予殺戮的自由越多，就造就了更多對被害的擔憂。”^[81]

Trayvon Martin 案引起的社會普遍呼籲是修法的直接動因，影響從佛羅里達州擴展到全國範圍內。有修改或推翻法案立法動議的州，包括阿拉巴馬、佐治亞、印第安那、弗羅裡達、肯塔基、路易斯安那、密西根、新罕布林等，有州議員、州長、學者等提出了修改或廢除 SYG 法案的建議，或者議案經過審議，但是迄今並未有真正實現的例子。

3 結論：正當防衛退避義務原則的評價與啟示

邱吉爾有一句關於防衛的名言：“當你面對來自他人的威脅之時，絕不要背過身去，試圖逃離這危險。如果你這麼做了，你就放大了一倍的危險；但如果你當時就直面這威脅，毫無懼色，你就將這威脅減半了。絕不要逃避什麼，絕不！”^[82]但是，這種面對國民的政治性宣示，強調的是正面的鼓呼，而法律人面對的則是無限複雜的個案情勢與價值選擇。學界對英美法正當防

衛認定討論熱烈的退避義務問題還較少關注。劉士心教授新近指出，“躲避原則”對中國刑法具有三個方面的啟示，即：不應將“正義不必屈從于非正義”絕對化，應當盡力減少防衛中對生命的損害；對致命性暴力與非致命性暴力分別設置使用條件，在使用致命性暴力防衛中增加躲避義務的要求；司法中應當區分不同情形的躲避義務，分別把握其範圍和限度。^[83] 本文對該論點進一步從晚近英美立法與司法現實問題展開，並對比大陸法系與我國的立場，對關於防衛人的退避義務，從上述論述中有如下判斷。

第一，英美刑法對正當防衛的成立更具規則主義堅守，成立正當防衛的條件更為精細。一般情況下大陸法系對正當防衛成立相比英美法系更寬鬆，但在對住宅等可不退避的場域則保護防衛人立場明確。大陸法系對正當防衛退避義務原則上肯定的立場，而其例外情形比較狹窄。大陸法系正當防衛構成要件中欠缺“不得已”要件，行為人並非只有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才能實施正當防衛。即便存在逃避、報警等其他同樣有效的法益保護措施，也不妨礙行為人直面侵害、出手反擊。英美刑法對防衛人躲避義務的退避原則與不退避原則的爭議，突出表現了一種動態的法益衡量原則，對正當防衛退避義務的研究與司法判例更為豐富與細緻。SYG 法案在多個州法出臺之後的效果，受到媒體、專業機構與學者的關注，並對其進行評估，並依據評估對法案的科學性進行評估。儘管相比之下，大陸法系對正當防衛的法益衡量過於粗糙。“探究國家保護我們的責任與個人使用暴力，甚至是致命暴力擊退和消除侵犯者的權利之前的界限，變得無比重要。並不存在一個簡單的規則來劃定國家權力和個人自保權利之間的界限。”^[84] 學理上的簡單論斷並不足以支撐案正確與規則有效。

第二，應當重視正當防衛認定的社會效果評價與思考，對我國正當防衛的“唯結果論”情形不可也不必矯枉過正，走向另一個極端。我國對防衛人躲避義務的論斷清晰，但缺乏說理。效果

性的評價，就如同美國相關機構對 SYG 法案的研究一樣，得出了這一旨在保護社會的立法效果卻是引發了暴力案件的增多。反觀我國，也同樣存在如此情形。以於歡案為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討債公司的暴力、非法拘禁、侮辱等手段在社會上是普遍存在的，而法律暫時或者可預見的長期時間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於歡遭遇到的“辱母”，當然正常人都會無比憤怒，但卻算不得少見——畢竟面對人性之惡遠甚於此的刑事案件每天發生。如果債務人（哪怕是非法債權）遭遇此類侵權，就可以無限制地採取致命性暴力，這無疑有賦予其“殺人之刀”。在社會治理無效的背景下，對正當防衛認定的個案問題無疑將成為賦予社會正確性期待的規則問題。如果因此引發此類討債中的大量致人死傷的刑事案件增長，將是社會與司法無法承受之重。規範上對正當防衛的理解並不重視結果，而是基於行為本身。那麼實務是否屬於“唯結果論”，還需要考察實務判決中是否對防衛行為本身的正當性進行了恰當的闡釋。因此，更應當重視行為上的判斷。

第三，法益衡量與比例原則同樣制約正當防衛的成立。必要性因素是正當防衛，特別是採取致命暴力手段防衛手段成立的判斷要素，退避義務並非完全沒有適用的空間。法益衡量貫穿英美法對退避原則的討論。“退避原則本身從不是旨在提高無辜者的危險；其正確適用也不要求沒有過錯的受害人以其自身受傷害的可能性提升，來更好保護侵害者的安全。”^[85] 比例原則要求的防衛與危害的適應性是法益衡量原則的具體落實。儘管我國刑法規定“防衛限度”和“避險限度”都採用了“必要限度”一詞，但無論學界還是實務界都已達成共識：在判斷防衛行為是否超過限度時，並不需要像緊急避險那樣進行嚴格的法益衡量。正當防衛是相比緊急避險有更為充分的自主權。不能將緊急避險中的“不得已”要件“偷樑換柱”到正當防衛中來。^[86] 緊急權（Notrecht）是公民在緊急狀態下為保護法益而損害他人法益的權利。利益衡量是一切緊急權的基礎。利益衡量

理論的立場並不是簡單地認為，在為維護更好價值的利益時，犧牲較低價值利益的行為是合法的。傳統的單一法益衡量說已經走向綜合的利益衡量說。不再是以“人身權利大於財產權利；人身權利中生命最高；財產權利以財產價值大小來衡量”的公式的簡單對比，而是綜合危險的急迫程度、危險源與避險物件的關係、法益損害的強度、行為人對危險狀態的責任等事實具體考察。在眾多緊急權中，正當防衛權是在行使過程中所受限制條件最少、進攻性最強的一種，那麼法律在授予公民正當防衛權時必然慎之又慎，既要保證公民能有效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要為這種激烈的自

救方式的適用範圍劃定合理的邊界。“必要性原則的深層意義在於，所有人的生命，包括暴力犯罪者的生命，都是有價值並值得保護的。”^[87]有學者主張，當不法侵害的程度沒有達到嚴重的不法侵害時，可以按照防禦性的緊急避險來判斷，將無責任能力者的侵害等排除出正當防衛的正當性體系中。^[88]陳興良教授指出，我國司法實踐中正當防衛制度未得到有效實施的表現是，防衛人的利益優先未被貫徹，是一種司法偏差。^[89]但是，正當防衛的極端強勢性，更決定了其適用範圍的謙抑性，而在致命性暴力場合的退避義務需要在實踐中闡述和明確。

參考文獻

- [1] 勞東燕：《防衛過當的認定與結構無價值論的不足》，《中外法學》2015年第5期，第1334頁。
- [2] 參見陳曙：《侵害人視角下的正當防衛論》，《法學研究》2015年第3期，第120頁；勞東燕：《防衛過當的認定與結果無價值論的不足》，《中外法學》2015年第5期，第1334頁。
- [3] 沈德詠：《我們應當如何適用正當防衛》，《人民法院報》2017年6月26日，第2版。
- [4] vgl. Roxin, (Fn. 18), S. 398; Kindhäuser, Zur Genese der Formel das Recht braucht dem Unrecht nicht zu weichen“, in: Freund/Murmann/Bloy/Perron (Hrsg.), Frisch-FS, Berlin 2013, S. 494; Bülte, (Fn. 13), S. 146-147; Neumann, Individuelle und überindividuelle Begründung des Notwehrrechts, in: Lüderssen (Hrsg.), Modernes Strafrecht und ultima ratio Prinzip, Frankfurt a. M. 1990, S. 219. 轉引自許達恒：《從個人保護原則重構正當防衛》，《台大法學論叢》第45卷（2016年）第1期，第344頁。
- [5] 黎宏：《“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人民法院報》2019年7月25日，第006版；於海明正當防衛案，檢例第47號，《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二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2018年12月18日。
- [6] Vgl. Roxin, (Fn. 1), § 14 Rn. 40; Jescheck/Weigend, (Fn. 1), S. 326; Schaffstein, 轉引自許達恒：《從個人保護原則重構正當防衛》，《台大法學論叢》第45卷第1期。
- [7] 張明楷：《刑法格言的展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頁。
- [8] 參見高銘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頁。
- [9] 參見陳家林：《外國刑法：基礎理論與研究動向》，陳家林著2013，第133頁。
- [10]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207頁。
- [11] Vorallem, Kühl, (Fn. 1), § 7 Rn. 78. 轉引自林鈺雄：《新刑法總則》，元照2014年9月4版，第252頁。
- [12] 許達恒：《從個人保護原則重構正當防衛》，《台大法學論叢》第45卷（2016年）第1期，第322頁、369-370頁。
- [13] 參見張明楷：《責任刑與預防刑》，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2-63頁。
- [14] 參見佐伯仁志：《日本正當防衛論之新開展》，黃士軒譯，《月旦法學雜誌》，第177期（2010年），第172-175頁。
- [15] 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446頁。
- [16] 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442頁。
- [17] 參見薛泰成：《德國刑法中合法化事由的體系》，薛泰成自發行，2007年，第43頁。
- [18] vgl. Wohlers, (Fn. 45), S. 434-435, 轉引自許達恒：《從個人保護原則重構正當防衛》，《台大法學論叢》第45卷（2016年）第1期，第374頁。
- [19] 許達恒：《從個人保護原則重構正當防衛》，《台大法學論叢》第45卷（2016年）第1期，第374、376頁。
- [20] 昭和30•10•25刑集9卷11號2295頁
- [21] 昭和46•11•16刑集25卷8號996頁
- [22] 昭和52•7•21刑集31卷4號747頁
- [23] 東京地判平成14•1•11刑集
- [27]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第二庭編：《刑事審判參考》（第45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頁。
- [25] 參見劉憲權：《刑法學（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頁；蘇惠漁主編：《高等政法院校法學規劃教材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頁；賈宇主編：《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27頁。從司法考試等教材來看，這一觀點也得到了認可，參見羅翔編著：《2014國家司法考試教材一本通：刑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頁。

- [26] 陳興良：《正當防衛論》（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頁。
- [27]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第二庭編：《刑事審判參考》（第45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頁。
- [28] 陳璇：《侵害人視角下的正當防衛論》，《法學研究》2015年第3期，第120頁。
- [29]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184-8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769).轉引自Cynthia V. Ward, "Stand Your Ground" and Self-defence, 42 Am. J. Crim. L. 89 2014-2015.
- [30] See, e.g., Edward Coke, *The Third Part of 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 55-56 (1669)
- [31] Julien [1969] 1 WLR 839, Law Relating to Self Defence, Eric Baskind LL.B (Hons), FHEA, MCI Arb 7th Dan B.J.J.A.G.B.
- [32] See A. J. Ashworth, Self-defence and the Right to Life, 34 Camb. L.J.282(1975)
- [33] Erwin v. State, 29 Ohio St. 186, 194-99 (Ohio 1876))
- [34] 57 Ind. 80 (Ind. 1877)
- [35] 158 U.S. 550(1895).
- [36] 256 U.S. 335 (1921).
- [37] "Detached reflection cannot be demanded in the presence of an uplifted knife."
- [38] See generally Christine Cantalfamo, Note, Stand Your Ground: Florida's Castle Doctrin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4 RUTGERS J.L. & PUB. POL'Y 504, 509 (2007)
- [39] Cynthia V. Ward, "Stand Your Ground" and Self-Defense, 42 Am. J. Crim. L. 89, 105(2015).
- [40] Richard Restak, The Law: The Fiction of the "Reasonable Man", WASH. POST, May 17, 1987, at C3.
- [41] Culverson v. State, 797 P.2d 238 (Nev. 1990).
- [42] Richard Maxwell Brown, Southern Violence-Regional Problem or National Nemesis?: Legal Attitudes Towards Southern Homici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32 VAND. L. REV. 225, 232 (1979), 507-508
- [43] MODEL PENAL CODE § 3.04(2)(b)
- [44] MODEL PENAL CODE § 3.04(2)(b)(ii)(i).
- [45]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 221, 6th ed. 2012, at 221-222.
- [46]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 221, 6th ed. 2012, at 222.
- [47] State v. Norman, 378 S.E.2d 8, 13 (N.C. 1989).
- [48]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 221, 6th ed. 2012, at 228.
- [49] 參見[美]約書亞·德雷斯勒：《美國刑法精解（第四版）》，王秀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頁，註腳[36]。
- [50] 趙秉志主編：《英美刑法學（第二版）》，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頁。
- [51] 儲槐植、江溯：《美國刑法（第四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頁。
- [52] James D. Brewer, *The Danger from Strangers: Confronting the Threat of Assault* 119 (1994)
- [53] Fla. Stat. §§ 776.012, .013, .031, .032 (2005).
- [54] Christine Catalfamo, Stand Your Ground: Florida's Castle Doctrin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utgers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Fall 2007, Vol 4:3.
- [55] Daniel Sweeney, Standing up to "Stand Your Ground" Laws: How the Modern NRA-Inspired Self-Defense Statutes Destroy the Principle of Necessity, Disrupt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Increase Overall Violence, Cleveland State Law Review, Vol. 64:717, 2016.
- [56] Joshua Prince, Allen Thompson, The Inalienable Right to Stand Your Ground, St. Thomas law Review, Vol.27,2015. pp.47
- [57] 122 So. 110, 116 (Fla. 1929).
- [58] Hedges v. State, 172 So. 2d 824, 827 (Fla. 1965).
- [59] Fla. State v. Bobbitt, 389 So. 2d 1094, Fla. 1st Dist. Ct. App. 1980; State v. Bobbitt, 415 So. 2d 724 (1982).
- [60] 732 So. 2d 1044 (Fla. 1999).
- [61] Redondo v. State, 380 So. 2d 1107, 1110-11 (Fla. 3d Dist. Ct. App. 1980).
- [62] Frazier v. State, 681 So. 2d 824, 825 (Fla. 2d Dist. Ct. App. 1996).
- [63] 867 So. 2d 414 (Fla. 3d Dist. Ct. App. 2003).
- [64] Baker v. State, 506 So. 2d 1056, 1059 (1987)
- [65] Alabama: Code of Ala. § 13A-3-23(a)(3); Arizona: A.R.S. § 13-411(A); Florida: Fla. Stat §§ 776.031, 776.08; Georgia: O.C.G.A. § 16-3-23(3); Kansas: K.S.A. §§ 21-3212, 21-3213; Kentucky: KRS § 503.080(2)(b); Nevada: Nev. Rev. Stat. Ann. § 200.120(1); Oklahoma: 21 Okl. St. § 643(3); Texas: Tex. Penal Code § 9.42.
- [66] Texas: Tex. Penal Code § 9.42(2)(B).
- [67] Kansas: K.S.A. §§ 21-3212, 21-3213; Nevada: Nev. Rev. Stat. Ann. § 200.120(1); Oklahoma: 21 Okl. St. § 643(3); Texas: Tex. Penal Code § 9.42
- [68] Alabama: Code of Ala. § 13A-3-23(d); Florida: Fla. § Stat. 776.032(2); Kansas: K.S.A. § 21-5231(a); Kentucky: KRS § 503.085(1); Oklahoma: 21 Okl. St. § 1289.25(G); South Carolina: S.C. Code Ann. § 16-11-450(B).
- [69] Alabama: Code of Ala. § 13A-3-23(e); Florida: Fla. § Stat. 776.032(1); Georgia: O.C.G.A. § 16-3-24.2, Kansas: K.S.A. § 21-5231(a); Kentucky: KRS § 503.085(1); North Carolina: N.C. Gen. Stat. § 14-51.3(b); Oklahoma: 21 Okl. St. § 1289.25(F); South Carolina: S.C. Code Ann. § 16-11-450(A).
- [70] Alabama: Code of Ala. § 13A-3-23(d); Arizona: A.R.S. § 13-413; Florida: Fla. Stat. § 776.032; Kansas: K.S.A. § 21-3219; Kentucky: KRS §§ 503.085; Louisiana: La. Rev. Stat. Ann. § 9:2800.19; Mississippi: Miss. Code. Ann. § 97-3-15(5); North Carolina: N.C. Gen. Stat. §§ 14-51.2(b), 14-51.3(b); Oklahoma: 21 Okla. Stat. § 1289.25(F); South Carolina: S.C. Code Ann. § 16-11-450(A); Texas: V.T.C.A. § 83.001.
- [71] Travis, Jessica and James, Jeffrey, Know the Ground You're Standing On: Analyzing Stand Your Ground and Self-Defense in Florida's Legal System," Barry Law Review: Vol. 20: Iss. 1, Article 5. p.91 (2015)
- [72] Aya Gruber, Race to Incarcerate: Punitive Impulse and the Bid to Repeal Stand Your Ground, 68 U. Miami L. Rev. 961 2013-2014,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Vol. 68:961. (2014)
- [73] Linda Kliendienst, Welcome to Florida, But Look Out: Expanded Self-Defense Law Sparks Campaign to Alert Guests, SUN-SENTINEL (Ft. Lauderdale, Fla.), Broward Metro Edition, Sept. 26, 2005, at 1B.
- [74] 全文參見：The Honourable Jennifer Carroll, Governor's Task Force on Citizen Safety and Protection (2013), available at <http://>

- www.flgov.com/wp-content/uploads/2013/02/Citizen-Safety-and-Protection-Task-Force-Report- FINAL.pdf.
- [75] Campbell, R. Christopher (2015) "Unlawful/Criminal Activity: The Ill-Defined and Inadequate Provision for a "Stand Your Ground Defense," Barry Law Review: Vol. 20: Iss. 1, Article 3, pp.44.
- [76] Daniel Sweeney, Standing up to "Stand Your Ground" Laws: How the Modern NRA-Inspired Self-Defense Statutes Destroy the Principle of Necessity, Disrupt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Increase Overall Violence, Cleveland State Law Review, Vol. 64:715, 2016. p.717.
- [77]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National Task Force on Stand Your Ground Laws Final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Sep. 2015. P.4
- [78] Megale, E.B. (2010). "Making Murder Legal: How Laws Expanding Self-Defense Allow Criminals to "Get Away with Murder." Working Paper. Retrieved May 20, 2012 from http://works.bepress.com/elizabeth_megale/1.
- [79] Chandler B. McClellan, Erdal Tekin, Stand Your Ground Laws, Homicides and Injurie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8187, June 2012. <http://www.nber.org/papers/w18187>
- [80] Cheng, C. and M. Hoekstra (2012). "Does Strengthening Self-Defense Law Deter Crime or Escalate Violence? Evidence from Castle Doctrine."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exas A&M University.
- [81] Elizabeth Megale, A Call for Change: A Contextual-Configurative Analysis of Florida's Stand Your Ground Laws,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Vol. 68:1051.p.1094.
- [82] One ought never to turn one's back on a threatened danger and try to run away from it. If you do that, you will double the danger. But if you meet it promptly and without flinching, you will reduce the danger by half Never run away from anything. Never! (Sir Winston Churchill)
- [83] 劉士心：《英美刑法正當防衛中“躲避原則”及其啟示》，《中國刑事法雜誌》2017年第5期，第113頁。
- [84] [美]喬治·弗萊徹：《地鐵裡的槍聲——正當防衛還是持槍殺人》，陳緒剛、範文潔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頁。
- [85] Wayne R. LaFare, Modern Criminal Law: Cases, Comments and Questions, 4th edition, Thomson West (2006), pp.492.
- [86] 劉沛清著：《刑法的實踐面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1-52頁。
- [87]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 221, 6th ed. 2012, at 228.
- [88] 參見趙雪爽：《對無責任能力者進行正當防衛兼論刑法的緊急權體系》，《中外法學》2018年第6期，第1614頁。
- [89] 陳興良：《正當防衛的司法偏差及其糾正》，《政治與法律》2019年第8期，第41頁。

校園生活

澳科大致力推廣節能文化 建設可持續綠色智慧校園

今年，澳門科技大學連續第13年支持由澳門特區政府能源發展辦公室主辦的“澳門節能週2020”活動。作為是次活動協辦單位之一，澳科大全體教職員積極響應“齊熄燈，一小時”和“便服夏”活動，共同節約能源，減少排放，支持環保。

澳科大以實際行動積極支持節能減排，包括響應主辦方建議，於6月15日晚上8時30分開始關掉大學9棟建築物非必要的燈一小時；呼籲教職員當天晚上在家參與熄燈活動；在“便服夏”活動期間，調節室內空調系統溫度維持不低於25°C；在不影響專業形象前提下，大學教職員穿著輕便服飾上班，共同營造輕裝上班的節能文化等。

雖受新冠疫情影響，大學宣傳推廣節能的行動並沒有停止，在加強校園防疫措施，確保環境安全的前提下，6月16日，唐嘉樂副校長、龐川副校長、鄭應華副校長和孫建榮協理副校長帶領學院和行政單位代表人員一同穿上大學和學院的彩色T恤，身體力行，共同倡導節能減排等環保理念。

近年來，澳科大大力支持環保和推動綠色能源發展。於2019年大學新落成的R座綜合教學大樓是以綠色環保設計理念出發，作出整體規劃和建築單體設計。整體規劃方面，在不改變大學整體發展的合理佈局模式且滿足新大樓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科學規劃，為今後大學發展預留足夠的用地空間；儘量減少硬質鋪地，多配置綠色喬木灌木等。建築單體設計方面，外牆採用可回收利用的“穿孔”金屬鋁板材料，充分利用自然採光、自然通風，減少對用電設備的使用率；照明多以具有節能、長壽、環保特性的LED燈為主；通過智慧化設計，控制升降機的使用以及按日常時段需要控制燈光；根據實際空間使用需要的溫度、濕度、風力的情況，自動調節空調的開閉和空調量，從各方面保證新大樓可持續發展等。